

无悔的昨天

◆ 肖秋非

高尔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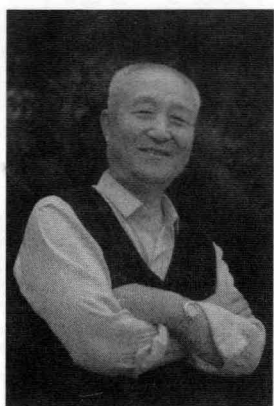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老人的真实回忆

无悔的昨天



摄影于1986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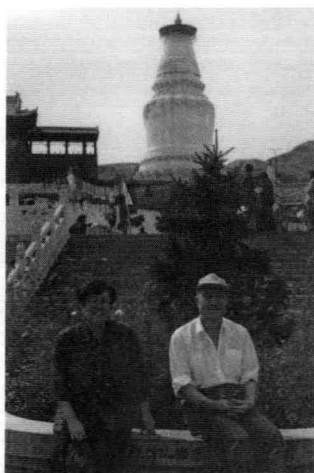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老人的回忆



摄于88年 烈士公园



摄于88年 烈士公园



摄于
五台山



摄于96年 北京



摄于93年 冶金干校

跋

回望硝烟,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向我们走来,我们能看见他怎样从摇篮里站起,迈过门坎,走出小院,走上街头,走上学校;又怎样从学校突出重围,走进革命队伍,走向炮火连天的战场。我们不但看见了他的脚印,还能听见他那清晰而有力的脚步声。每一个脚印发出的回声,都会在我们心中引起深深的共鸣,在我们脑海里引发不尽的思考。这就是二十世纪一代知识份子共同的心声。

这是一部真诚感人的书。作者用虚拟的名字,谱写出了最真实的故事,一部活生生的自传。

这本书的特色在于:它没有停留在往事的回忆里,而是以先行者的目光回顾过去,以共产党人的胸怀去拥抱未来。作者的经验以及他的心路历程,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、下一代人读了也会获益不浅。

这部书只记录了作者的前半生,主要是战争年代的生活。在我看来,它只能算作自传的上集:一个人从呀呀学语到走向成熟的过程。前半生这20多年,已经够精彩了;后半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,那更是星光灿烂的岁月。我衷心希望作者能尽快恢复健康,谱写出它的姊妹篇来。

张 行

2003年11月28日

目 录

乡恋	(1)
迷茫	(14)
险途	(16)
上路	(32)
赶路	(39)
洗礼	(61)
入党	(81)
特殊的战斗	(91)
探家	(103)
认真	(109)
告别	(117)
走路	(122)
招生	(126)
剿匪	(131)
散记	(137)
出国	(141)
修坝	(147)
寻亲	(150)
归来	(160)

乡 恋

我是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七十岁才回到老家辽宁抚顺。这时已经是本世纪的最后几年，人早已一头白鬓，走路踉跄了。虽然是老了，但是不服老，总想在家乡找回点什么！找什么呢？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于是我总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到浑河边，站在桥头上，思绪连翩。远看、近看、左看、右看，可是映入我眼帘的一切都回答不了我要找的东西。从心底深处，不断地提问自己：这哪里还是故乡呵？可是我又明明是站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是在养育过我长大的浑河边上。五十多年前的家乡不见了，乾隆皇帝批准建的抚顺城不见了，我们住过的四合院不见了，连我读过书的“一小”（第一小学）也不见了。还能见到的只有几个面目全非的城北高尔山、火车站上的旧水塔，再就是脚下的浑河和浑河上的一座日本统治时期建的老铁桥了。就是这高尔山，旧水塔、老铁桥也都变了，早已没有昔日的模样。高尔山被高耸入云的现代建筑比矮了，火车改内燃，水塔已无用武之地，只好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好像在等待什么，不知哪一天就等到被拆除的命运。日本人修的铁桥，听乡亲们说五十年代就加宽了，加宽后还不够用，现在浑河上有四座大桥，蔚为壮观。我要找的东西看不见，就问问我的那些同龄人，他们告诉我的话，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，就是“变”。高粱米变大米、四合院变高楼，烧煤变煤气，取暖变暖气、马车变汽车、公路变高速、瘦子多变胖子多……等等等等。他们说的都是我愿意听的，可是并没有回答我想要找的东西。慢慢地品出味道了，我要找回来的东西是昨天，而昨天是在回忆里，是在“变”的原因里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早已“变”得不那么外在了。而回忆是苦涩的，又是甜蜜的，如果

在回忆中能够说一句无悔的昨天,我也感到无比欣慰了。

沈阳城东九十华里,浑河北岸,有一条叫下二冲的大山沟,沟里有一座像是骏马欲奔似的大山,雄伟壮观,可是它却没有什麼名气,因为它生的地方太鲜为人知了。其实像这样的山在长白山下是比比皆是的。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,山上长满了榆、柞、白桦、落叶松……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灌木丛:而更多的是野杏、山梨、榛子树。山下有一个村庄。这个村庄是顺着山脚从西向东一字儿排开的。它有二十几栋草房形成的八、九个农家小院,还有一条受季节影响的小河从村前流过。就是这么个小小的村庄,却有个很美的名字叫杏花山。它就是我们李家闯关东、到东北后,五、六代人繁衍生息的地方。

杏花山是个山高石头多的穷地方。不少人除了种田外,还会在夏末秋初时上山割柴砍树,到了冬天才套上笨重的牛车、马车、花轱辘车,装上劈得整整齐齐的木柴上沈阳去卖,这样才能勉强的度日糊口。那时,我还只有五、六岁,但是我还能清楚的回忆起来卖柴车起程的情形。每逢冬天的早晨,我还在睡梦中,总是被拉柴的车轮辗着积雪,吱呀的声音惊醒。它那沉重的声音,叫人感到压抑、心闷,着实叫你不好受。每逢听到这种声音,奶奶都可以告诉我,这是谁家的车又起程了。她老人家就会双手合十地祷告神佛,愿他们一路平安。童年的时候,很不理解祖母的行为,等我一天天长大了,才从村里的许多卖柴出车的故事里,明白老人们的心情。那个时候套车上沈阳卖柴,就像海边渔民出海打鱼一样,冒着很大风险。海上是风是浪,陆地上要涉浑河,过关卡,何况路上又有土匪拦截。我的曾祖父就是淹死在浑河冰窟窿里的,每逢奶奶讲到李家创业史时,总要讲一遍这段故事。

这里的冬天是漫长的。除了赶车卖柴的吆喝声,车轮的滚动声外,就是村前大车道上,大风卷着雪花刮来刮去的飕飕声。人们都像冬眠一样,蹲在家里的炕头上、灶坑边,不肯出门一步。有钱

的人家有炉子和火墙取暖，大人孩子也乐融融。穷人就只有一家人扯着一条鱼网似的破被子，围着一个烤火盆一起熬着。火盆里装的是做饭时没有烧尽的余灰，大家围着它，从天明挨到天黑。

春天来了。大地苏醒，人们也苏醒了。从火盆边、热炕上走下来，袖着手推开门，来到院子里，吸着湿润的甜甜的空气。闻惯了一个冬天热炕上的土腥味的人们，还来不及好好吸上一次这甜甜的空气，就要忙起春耕了，因为季节不等人。也只有这个季节，杏花山才是最美的：一簇簇杏花突然开放，特别是粉红中又夹着几点白色的梨花，远看像是粉红的轻云飘浮在山间，近看如少女笑脸相迎。就在这轻云中，掩映着几户人家，着实可爱。这时候那条村前的小河，也因为春雨雪化而活了起来，欢唱着从村前流过。它伴着农民下种敲的梆子声，布谷鸟的叫声，合成了一曲真正的春之歌。我今年已是古稀之年，每每想到这里，就会心旷神怡，乐不可收，这不是比陶翁的《桃花源》还要美吗？我走遍了长城内外、大河上下，见过不少名山大川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：“还是我的家乡美。”它象一杯醇酒，伴着我走过了大半生。

杏花山下，顺着山脚排列的一溜草房中间，有一座青砖砌的围墙，有门楼的四合院，村里人管它叫大院子。不知是根据什么叫起来的？我分析可能有两个理由：一是院子里住的祖父排行老大；二是这个院子是全村唯一用青砖砌的房子。而我祖父不仅是排行老大，而且是全村李家的主事人。所有村里的大事小事多半在这个院子里议论、决定。我长大以后，听奶奶说：生我的那一天，是财神爷的生日，就因为这，曾经使沉闷的山村一阵轰动。用现在的话说，算得上是七里八村的“头条新闻”。当我满月的时候，亲朋好友都来祝贺，那些非亲非故的人也来凑热闹，非要看一看和财神爷同生日的孩子，弄的好几天“大院子”门庭若市。有的说：“这孩子生的时辰好，长相也好”；“不发大财，也要当大官的”。一个叫“铁算盘”的算命瞎子也来赶热闹，要替我“批八字儿”，并扬言“分文不

取”。说：“这孩子的命太好了，好得不可言传”。他趴着我祖父的耳朵说了许多话，并再三嘱咐：“不可外传，一传就不灵了。”我的这位祖父是很守信的，他连我奶奶都没有告诉，很怕把孙子的命运搞坏了。所以到今天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瞎子在我祖父耳边说了什么。但是奶奶告诉我，“铁算盘”在我家住了三天，临走还带上十个大银元。现在看来，“瞎子”肯定是作古了，但是他骗人的本事并不比现代人差。而我祖父却带着他的话，也早已作古了。你别看他是个瞎子，他可以把一个有头有脸的“明白人”骗了一辈子，一直到进了坟墓。

我童年时的生活，还能想起来的就是在山村过春节。到了腊月，祖父就要用好几天的时间收拾他的牛车。他把挽具缠上红布，鞭子上加点红绸子，套上他的壮牛们，再装上几袋子粮食，就轱辘轱辘地上抚顺城了。抚顺城是沈阳东一个重镇，传说还是乾隆皇帝到东陵祭奠他的祖先努尔哈赤时，下令建城的。在满族没有进关以前，抚顺城是个重要的交易场所。汉人从关内带来布匹、铜器到这里跟从长白山下来的满族人交换马匹、兽皮、人参等，到了民国初年，市镇已经发展成一个工业城市。这里虽说不是重要的交易场所，却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区。

祖父赶着牛车走二十七华里，年年如此的到镇上办年货。据说从我太爷开始，每逢过春节都是这样的。祖父显然是继承了曾祖父的规矩，到了过年时，总是拉上粮食到镇上，而且是到一家叫‘源生茂’的货栈院里。牛车进了院子，就会有一个小伙计出来急忙接过祖父的鞭子，帮助卸车、拴马；掌柜的便马上出来把祖父迎到一个安静的去处，坐下来以后，照例是烟、酒、茶的招呼一番。祖父的主要事情是结算今年的粮食销售帐，谈好明年秋粮合同。大事办完了，这才是办年货的时间。往年办年货，他老人家只是交待一句：“同去年一样”也就行了。可是这一年不同了，孙子长大了。他特意交代了一句：“掌柜的，要多加几挂鞭炮吧！孙子大了，天天

喊着就要这东西。”掌柜的见到我祖父的得意劲也很知趣，马上就说：“孙子要的，我奉送了，老哥。”至今我还能回忆起，祖父交给我鞭炮的得意神采。天快要擦黑的时候，奶奶和妈妈就忙起来了。她们先把我装扮起来，头上戴上大皮帽子，手上是手扣子（一种棉手套），再加围巾和爷爷的短皮袄。这时，奶奶才穿上不轻易上脚的白毡鞋，一步三摇的带我到大门口迎接办年货的祖父和他的牛车。当我顺着村前大道，望见村口上牛车出现的时候，我就会沿着车辙印飞奔而去；奶奶就会在我身后笨拙地像跑又像走似的跟着，喊着我的小名。这时祖父就会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停下来，再急忙来到车前把我抱上车，坐在他老人家的腿上，一起吆喝着牛们向院门走去。这时院门早已由爸爸、妈妈打开，正站立两边，像是欢迎胜利归来的“老将军”似的，连车带人拥进了小院。爸爸妈妈把用蒲包捆着的年货拿到堂屋里，我就要求把鞭炮拿出来看一看。这也许就是我童年时最大的快乐了。

大年初一的早晨，依着老规矩，我要由爸爸带着到全村本家去拜年。我还能清楚的记得，这一年我穿上了妈妈在年前为我赶做出来的棉旗袍，衣服的前襟有点长，总是绊脚，一不小心就要摔个跟头，滚上一身雪：头上戴的是像六块瓦片互拼起来的帽子，帽子上面挂着一个装饰物，很是显眼，说是玛瑙，其实是一个玻璃珠子。脚上穿的是走不动路的毡靴。这种打扮，大概就是当时北方农村孩子最时髦的装束了。

我是全村李家的长孙，见人都比我大一辈。这就要从村东头拜起，一直拜到村西头。见到老头和老太太要磕头，我是情愿；遇见那些小子、丫头们也要拜年，我是着实不高兴的；还有抱在他妈怀里的婴儿，也成了“叔叔、姑姑”了，我是绝对的抗议不拜了。就这样回到家中已是下半晌了。走这一趟收获是不小的，要用棉袍的大襟兜满了东北农村儿童过年喜欢的东西：枣子、栗子、花生、榛子、山楂，还有红纸包着的压岁钱；而我最高兴的是鞭炮。因为东

西太多,我和爸爸一起抱着,一直走完了最后一家。有一家那是我叫六爷爷、六奶奶的家里。六奶奶人很好,见我累得满头大汗,指着我爸爸的鼻子批评一通,然后出门从东厢房的仓库里,拿来一个北方最流行的盛物工具“柳条筐”,样子很像南方的竹篮,把兜着的拎着的都装进筐里,实在装不下的,就由我也叫不上名字的姑姑叔叔们,连背带抱的送我们回了家。到家的时候,我已经在姑姑们的背上睡过去了。等妈妈把我叫醒吃晚饭时,早已是掌灯十分,全家人都看着我乐呢!这就是我童年时,一个生活的横切面。

1931年,发生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全境,成立了伪满洲国,建立了法西斯统治。乡村不太平,闹土匪,母亲带上我搬进了抚顺城。

抚顺城座落在高尔山的山脚下,紧靠浑河北岸,有沈吉铁路从他身边通过。它是一个周长只有三华里的小城,全城只有两个城门,从南门到北门有一条大街,把小城分成东西两半。街两边各有四条胡同。我们家就住在西边第四条胡同底部的一个四合院里。东厢房是三间,妈妈带我和小妹住北屋,大姨家住南屋,中间是两家的伙房,也是出入门户的通道。妈妈和大姨姐俩是同年结婚的,我和表姐也是同年生的,她比我大三个月。虽然我父亲去北方谋事去了,因为大姨父的存在,却为我们的童年带来许多快乐。大姨父叫佟保功,字冬人,是从北平(北京)弘达学院毕业的。他先是在中学当老师,以后又当上了南关税务所的主任。他高高的个儿,宽宽的脸庞,一双大眼睛慈祥有神。他还懂点医学,除上班外总是利用闲暇时间,到左邻右舍去为孩子们种牛痘。我右臂上的牛痘就是他种的。有些小病他还可以开出药方来。大家都喜欢他,喊他佟老师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,他就是中共抚顺特委第三支部的支部书记。

我和表姐佟淑瑶七岁上学,上学第一堂课的作文是:“人、一人、二手、你有手、我也有手、兄拉弟走,开步走,一二、一二。”我们把它

当作儿歌，在院子里唱着、跳着。大姨父下班了，他推着自行车一进大门洞，听到我们的读书声，便放下车子喊住我们。他坐在门槛上，我们一起把他围了起来，喊着要他讲故事。从他的脸上，我们看到，这一次好象比平时严肃了许多。他没有讲岳飞，也没有讲老汗王努尔哈赤。他这回是从我们的课文讲起，告诉我们“人”是怎么回事。人除有两只手外，还有很多东西，从两只手、两只脚、两只耳朵……又讲到人有好人、坏人、有中国人、日本人、英国人……。以后他每天下班回来，都在这个门洞里给我们讲一种人。使我记忆最深，甚至影响我一生的，是他讲的中国人和中国的历史。中国古今的许多故事，我都是在那个时候听到的。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现代的詹天佑修铁路，证明中国人是很聪明的：从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烧鸦片到关云长刮骨疗毒，说明中国人骨头是最硬的；从蒙古人入侵中原到满人入关最后都成了中国人的一部分，说明中国人是个最会团结多民族的人……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，讲得我们心潮起伏，使我们联想到大姨父是最好的中国人，感到能当上中国人是多么幸运呵！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在“九高”当老师，日本警备队大肆搜捕抗日人士，搜查到大姨父时，他佯装对日本人恭敬，不慌不忙地摘下礼帽，并捏着对折的帽沿，从容的张开双臂，任日本人搜查全身。站在他身后的同事张文山这时却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他看到了大姨父在张开手臂向上举时，一支手枪就滑进了礼帽当中。

有位名人说：“人的心中是要有一个偶像的，不是好的偶像，就是坏的偶像。”我心中的偶像就是大姨父，和他讲的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。我今年 70 岁，就是怀着偶像和许许多多的故事走过来的。我带着这些故事，度过了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十四年。因为心中装着“我是中国人”，不知吃了多少苦头，受到日本老师的多少次白眼和打骂。我也是带着这些故事迎来了“八·一五”东北光复，见不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，又带着这些故事参加了革命。在长期革

命征途中，还带着这些故事参加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。也是这些故事，使我度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动乱，遭过难，受过苦。不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它让我总是保持了做人的尊严。

我七十岁才同我爱人一起回到故乡抚顺城。经过几番打听才知道，表姐佟淑瑶早已搬到哈尔滨了。我们赶到哈尔滨见到她时，她已是儿孙绕膝的老奶奶了。大姐也笑我：“你不也成了老爷子了吗！”是的，我们都老了，坐在那里回忆往事，回忆抚顺城的童年生活，想起了四合院的东厢房，谈到了大姨父的许多故事。大姐激动地从衣箱里拿出来一个红布包，小心的打开它，是一个小木盒，木盒里装的是当年大姨父用过的种牛痘用的三角刀。木盒已经发乌，刀上有点点锈迹。我一见到它，就眼泪盈眶，差一点喊了出来。我对它太熟悉了。童年的时候只要有机会，我们就跟在姨父身后，看他左一家右一家的为孩子们种牛痘。现在我不自觉地摸到自己左臂上的三颗痘花。痘花还在，刻痘花的刀还在，可是种痘人六十年前就成亡人了。

佟大姐告诉我：1937年8月，中共抚顺县委改组，成立了抚顺特别支部，大姨父是第三支部书记，负责抚顺地区党的工作。这时早已叛变的苏振九，窃取了组织部长职务，与日本特务武田博合谋，于10月4日将大姨父抓走，押往奉天（沈阳）。在押期间，他与敌人针锋相对，视死如归地进行了斗争。11月5日敌人以“无悔改之意”进行处决。

大姨父就义后，遗体运回抚顺城时，全城哀恸。有的人前来讨债，听说佟保功是共产党员，是为了抗日筹款而借贷，也都流泪而去。他的死激起了更强烈的抗日情绪。烈士走后，大姨带着孩子们过着凄风苦雨的日子，度过了十多年日本统治的苦日子。她们靠的就是烈士的革命精神，靠的是“我们是中国人”。

大姐和我还有我爱人，三个人这一晚彻夜未眠，谈到天明。我们围着大姨父的遗物——一个红布包，一套种牛痘的工具，我们发

誓：一定像大姨父那样，给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两代人种上痘花，增强免疫力，迎接 21 世纪。那就是爱国主义的“痘花”，社会主义的“痘花”，马列主义的“痘花”。

临别时，我又摸着“痘花”，迟迟不愿离去。

我还有第二个故乡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父亲是一个中学生，在当时的杏花山，算得上是一个“人物”。他十六岁时和同族的玉叔，因地界问题打赢了官司，于是在十里八村内出了名。他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三，人家都称他三叔。就是这个三叔，在日本人进占东北之后，考进了吉林高等警官学校，学习成绩优异，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，成了伪满洲国的警察官。我七岁的时候，外祖父把妈妈、我和一个两岁的妹妹，送到爸爸工作的地方，一个叫扶余的县城。

扶余（现在的吉林省松原市）地处东北腹地，松花江平原上，吉林省同黑龙江省交界的地方。我还清楚的记得，在五十多年前，它还很荒凉，特别是春天，大风一刮，满天黄沙弥漫，不见天日。为防火灾，刮风的日子，是不能烧火做饭的，全靠到街头买些煎饼、腌菜拌凉水度日。从县城的南门口到松花江边，足有五华里，全是滚滚黄沙。就在我到扶余的那一年，在南门口左侧，竟奇迹般地被狂风刮出一座有前后大殿的老爷（关云寺）庙来。这座古刹不知被狂风卷着黄沙埋没了多少年，现在又是狂风将黄沙刮走，使它重见了天日。那时在全县城里也找不到一个考古的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原来还有一座偌大的古刹。这座古刹突然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人们面前，全城为之哗然，为之惊呆了。你看，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还在周仓的手上，栩栩如生的赤兔马都还完好无损地立在那里，连马身上的红漆，挽具上的镀金都没有脱落。于是人们就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。说得最多的是：“关老爷显圣了，日本鬼子长不了啦！”这是中国人的心声，胆小的放在心里，胆大的就说出口了。这时我正上小学，我们的日本老师却另外编造了一套言论，专门上了

一次大课,说什么:“关云长是武圣,是来帮助武士道的。”可是我们那些中国老师,特别是年岁大的却在课后告诉我们:“关老爷是硬骨头,他绝不会变节帮日本人忙的。”在家里看到父亲有点心神不宁。他把最喜爱的画着老虎的中国画,从正墙摘下来,然后把刚买的一张关云长坐着看“春秋”的彩印画像,恭敬的贴在正墙上,以后就一日三柱香地供奉起来,一到过节过年还要隆重的祭祀一番。他的这种行为、这种心态,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。

父亲是“地方官”,我的身份也“升高”了。客人叫我“少爷”,妈妈喊我“学生”,连小妹也哥哥长、哥哥短的喊着,再也不能直呼小名了。自己也觉得长大了,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;懂事越多愁人的事也就越多。家中出进的客人中有西装革履的;有长袍马褂的,他们都是求父亲办事的。那种求人的嘴脸我实在看不下去。因为他们总是拿我当幌子,指着礼物或者装钱的红包向我妈妈说:“太太:这是给少爷的,无论如何得收下。”我母亲总是一句话:“叫您破费了,实在过意不去。”这种对话听起来叫人脸红,听多了实在烦人,所以家里一来客人,我就总想往外跑,可又总是被母亲拦了回来。

在这里也过春节,那同在杏花山过节是不一样的,是两种节日。在杏花山过春节,是从心里向外高兴,这里过春节是从外往心里的不高兴。同样是大年初一的早晨,我一睁开眼睛,妈妈就下令了:“小玉,今天不要出去玩,家里有客人来。”其实我能招待什么客人,也只不过像‘东门外大车店门口挂的罗圈一样,是个招揽顾客的幌子。每次想到那个“罗圈”,心里就不舒服好几天,因为这个“罗圈”掩盖了大家的面子。一个只有八、九岁的小孩,只能眼巴巴的望着窗外,看着同伴们在院子里踢毽子、放风筝、滑冰、玩雪人。我心里一百个不高兴,也无可奈何,噤着嘴呆在屋里。我的童年,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官气加俗气的氛围中度过的。但是童年也不全是灰色的,也有金色的,那就是在校园和同学们在一起,有时因

为恶作剧，惹了祸犯了校规，受了处罚也挺高兴。

我读书的地方叫满蒙学校，是当时全县最好的学校。就是五十年后的今天，也还是松原市的实验中学。校园就在县城的东门外，过去曾是清兵的练兵场，民国时才改为学校。它有一个很大的操场，周围种了柳树，春天一来，柳丝冒出绿芽，风一吹那真叫婀娜多姿，美极了。就是这个时候，季节已经到了“小满”前后，从冰冻的大小兴安岭沼泽地里飞来了各种各样的鸟。有熨贴贝、三道门、黄豆瓣、红鸽，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鸟儿，在树林里，你看吧，红的、蓝的、花的、长尾巴的，美不胜收。下课了，我们就把打鸟的扣网（用铁丝做的，有点像老鼠夹子，但是他是捉活的用的）埋在操场的柳树下，等鸟儿入网。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苏文育，个头很小，又一脸麻子，但是数学课讲得特别好，又是我们的班主任，我还是他的得意门生，在班上当班长。这一天，上课时我无法集中精力听课，心里想的是打鸟的扣网，眼睛不时的向操场的柳树下望着。望着望着，看见树下冒出一股土烟，心里高兴极了，立即举手报告：“苏老师，我上厕所”。苏老师拿着教鞭看了我一会儿：“去吧。”我知道他有点犯疑，一定是想：李玉从来没有上课时要上厕所的呀！我这时也管不了这许多，立即向操场奔去。来到树下，果不其然，网中扣的是一只叫熨贴贝的山雀儿，不仅叫声好听，长得也特别美：黄色的肚皮黑脑门儿，背上是一块像熨斗一样的蓝色脊梁。我高兴极了，放在口袋里回到教室，心想下课后得把它送回家去。我刚迈进教室门，下课铃响了。我真高兴呵！疾速地向座位走去。苏老师叫了我一声：“李玉，你到前面来。”还没有等我走到讲台边，他就厉声地说：“把手抽出来！”我也急中生智，抽出手时，把衣袋盖拉了出来。一不小心鸟儿突鲁鲁地飞了出来，一下子教室像开了锅似的炸开了。全教室都是男生，学校规定一律留光头，所以只见光头转动。有捕鸟的、关窗户的、拿扫把的、抱鸡毛掸子的，还有的喊我：“李玉，快把门关上！”我知道坏事了。苏老师站在讲台上，一

动不动地看着我们闹得差不多了，他宣布：撤消李玉的班长，全班罚站一小时，还打了我手板十下，手都打肿了。我红着脸往家走，一群同学护送我，劝我，安慰我，心里感到特别舒服。我不是班长了，可是同学们伙伴们同我更亲近了。这年冬天考中学，我是全班第二名。

五十年后，我又来到了这个校园，这里已经是松原市实验中学了。原来的灰砖、灰瓦绿门窗的建筑全拆除了，被一座座七层的白色建筑群所替代，又重新修了一座八角亭。操场还是原来的，只是原来的柳树还有两棵，已长成两个人还抱不过来的大树了。大柳树可以见证，我就是在这两棵树中间惹的祸。我和爱人在树下，操场上，凉亭边，校门口都照了相。看门的老哥告诉我：前两天还有一对从美国回来的夫妇在校园里照相，也就是五十年前，在这个学校毕业的。我向他打听苏老师的下落时，他说：“人早已作古了，听说连个后代都没有留下。”我说：“老哥，后代是有的，我就是他的学生啊。”他点头称“是”。

一九四五年“八一五”，日本鬼子战败投降了。苏联红军按“雅尔塔”协议，解放了东北大地。为日本人服务的父亲就成了惊弓之鸟，带着全家人东藏西躲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这时，我已经十五岁，是个师范三年级的学生，许多事情都不十分明白，盲目的跟着父母走。从三岔河（现在的扶余县）到小弓棚子，又回到扶余县城，实在没有保险的地方。而铁路、公路交通全部中断，特别是土匪蜂起，想回抚顺老家是办不到的。到一九四五年底，大雪封江，我们全家才租用一辆大轱辘车，横过松花江，到了郭尔罗斯前期的一个蒙古人聚居的草原上。经朋友介绍，住进了一个叫小站的土围子里。土围子是干土垒的，远看像个土丘，近看才知道是土墙围起来的一个村落，四角修有炮台，叫炮台实际上是枪台，村里有人拿着枪或火铳（东北人叫洋炮的武器）站哨的地方。这种围起来的居住地，是不设防的。它多半是三十年代张作霖统治东北时，以防匪的名